

OS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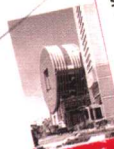
全球化·可持续发展·跨文化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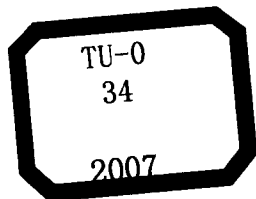
钟
华
楠

张
钦
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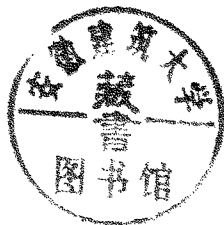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全球化·可持续发展·跨文化建筑

钟华楠 张钦楠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可持续发展·跨文化建筑 / 钟华楠, 张钦楠
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ISBN 978-7-112-08524-8

I.全... II.①钟...②张... III.建筑理论—文集
IV.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373 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董苏华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张树梅 王金珠

全球化·可持续发展·跨文化建筑
钟华楠 张钦楠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厦京港图文有限公司设计制作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³/₄ 字数: 162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2.00 元

ISBN 978-7-112-08524-8

(15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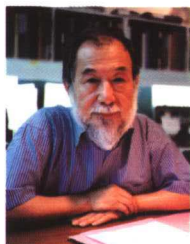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钟华楠

1931年生于香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Bartlett学院建筑系，在英国工作三年多，自1964年在香港开业至今。

曾任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城市规划上诉庭委员。现任香港大学建筑系及深圳大学艺术系名誉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及同济大学建筑系顾问教授、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及客座教授、中国建筑学会海外名誉理事。

著有《中国园林艺术》、《亭的继承》、《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n Hong Kong》、《“抄”与“超”》及一些散文和论文，散见于丛书及报刊。

爱好音乐、看书、品茶和书法，更喜欢与同道人一边喝茶饮酒，一边谈中西文化的异同；早年喜爱园艺、摄影和游览古迹。



张钦楠

1931年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地从事设计工作近三十年。曾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先后当选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美国建筑师学会和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师学会名誉资深会员及日本建筑家协会和俄国建筑家同盟名誉会员。主要著作有：《建筑设计方法论》、《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人文主义建筑学》、《阅读城市》、《特色取胜》及《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10卷，中、英文版，副总主编）等。

前言

为了参与对《现代文脉下中国现代建筑》的讨论和丛书的出版，经“楠弟”（张钦楠）建议，“楠兄”（钟华楠）同意，决定将我们二人分别撰写的论文合印一册，便于读者阅览和批评。

题目是从“全球化”开端的。被政界和媒体熙熙攘攘的“全球化”于20世纪后叶登场，一时风靡全球，被公认为当今（至晚21世纪）世界的发展趋向。在“一边倒”的开场之后，忽然冒出了一股不协调音。从美国西雅图开始，到最近的香港为止，只要是讨论“全球化”的高层会议，总有一帮基层群众示威游行，表示对“全球化”的抗议和反对。一时之间，“全球化”是红脸白脸，成为争议问题。

从其开端，“全球化”的提出是基于世界人口的急剧上升、全球生活和建设资源的匮乏和分布不均，以及电子化革命（互联网）所带来的人际距离缩短和“国界意识淡化”等等，于是一幅幅美妙的图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就亲身聆听过一位未来学家的报告，大意是将来一个跨国公司的新产品的诞生可以在纽约创意、在东京设计、在巴基斯坦加工生产，在巴黎或伦敦销售，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随着地球的转动在白天进行，从而达到前所未有的效率。我听了以后，当时确实兴奋了一番。

在1999年北京举行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时，我被指定就建筑师职业趋势问题作一主题报告。我的开场白就是：“全球化来了”（抄自民间童话中“狼来了”之故事），接着提出既然要“全球化”，就应当是双向的，你来我处，我也可以去你处，不能是你来要通行无阻，我去却处处设限。当时也颇有些朋友（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表示赞赏。

事过几年，我和许多人一样，真正体会到“狼来了”的现实，至少是在中国，洋人建筑师在许多城市“通行无阻”，中国建筑师只能当个配角，干的活多，拿的钱少，这种“与狼共舞”的局面，看来还要继续一段时间。按照“全球化”的原理，恐怕得长久“舞”下去，到我们自己

也和“狼”一样高明为止。

在很多反对声中，我学到了一些新名词，最响亮的是“新殖民主义”。人们开始指出，“全球化”推进以来，世界贫富差别不是减少，而是扩大了；资源消耗不是降低，而是升高了，乃至出现明暗兼备的能源战。在高层会议场内，是各国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在场外，是愤怒群众的示威抗议。

所有这些抗议和反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衡量“全球化”是否成功，关键看它是否导致“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又至少有两个标准：一是全球资源是否真正得到合理支配和使用，并且能否导致全球环境的改善？二是它是否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一个一再要求别国敞开大门，而自己却连《京都议定书》都不肯承认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全球化”？

楠兄的文章正是针对“可持续发展”而写的。楠兄早年留学并执业于不列颠王国，精通欧美文化，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和高深修养（他生肖属羊，对“羊”群有强烈的归属感），因而能高瞻远瞩，从历史的高度来考察和纵论“可持续发展”问题。

楠弟（恰好也生肖属“羊”）的文章是1999大会发言的延伸，其主要宗旨是在“全球化”的大形势下探索新的建筑“国际风格”：“跨文化建筑”之必要和途径。也就是说，真正的全球化不应当是你吞噬我，而只能是外来和本土文化的结合。我们只要对照一下上海外滩建筑和石库门里弄建筑，就可以看到何者更有生命力。

当然，文责自负，二文虽然合出一册，并不意味着其所有观点完全一致。诚望本册二文，能得到同业的批评与指正。

张钦楠
2006年1月

目录

前言	张钦楠
1 知其雄，守其雌——从可持续发展观点论中国建筑与 城规特色	钟华楠
85 跨文化建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风格	张钦楠
174 后记	钟华楠

知其雄，守其雌
——从可持续发展观点论中国建筑与城规特色

钟华楠

一、世纪之交 反思之时	3
二、“可持续发展”一词的起源	4
三、可持续发展——香港模式问题	7
四、保护生态、环境、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性	12
五、人类科技发达与人口增长问题	15
六、美国在21世纪的发展可持续否的问题	20
七、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问题	21
八、“中国建筑理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展望	26
九、人类在地球上可持续发展问题	55
十、结论	78

一、世纪之交 反思之时

正当 21 世纪之初，回顾 20 世纪人类的成就与失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但一个世纪中发生的大事何其多，如何选择呢？作为建筑师，视野有限，只能在建筑理论框架里，找寻一个与建筑业有关的题目，或许比较容易。

20 世纪末，常常听到“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建筑师说得多了，总统、议员、政客在竞选宣言中也用上了。政府发言人在宣传政府的政策（如国际关系政策、经济发展政策、高科技工业、商业等政策）亦用上了。天下一切事业，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但大多数人是用以作为说服他人和推动他人的政策手段。

究竟“可持续发展”一词起源于何时？什么是“可持续”，什么是“不可持续”？“可持续”是否只能指某人、某企业、某地区、某国或是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对甲“可持续”，对乙、丙、丁是否也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的狭义起码是指两方面或多方面，如我们日常最注重的是“我”和“我的家人”、“事业”、“朋友”的关系如何可以持续发展？其广义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和它的“国民”，国家与外国之间，“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如何可以持续发展？我们建筑师关心的是设计的“项目”与“使用者”的关系发展，是否可以持续？这种相互的“关系”的周围，还要看很多客观条件，如“关系”间的经济、人际基础、互保互爱的态度与行动、持续的滋养和生长，能否延续到最长的时空。

但一个人的“可持续发展期”，只限于“这个人”与他“生命期”的时空！所以，“可持续发展”道德上必须顾全到“下一代”的生存，使个人生命、信仰、目的可以延续，才有意义。中国诸子的巨著，两千多年来影响我们，甚至世界，最初多是口述，由弟子写成；二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二千年前的耶稣，他们的佛经、圣经，都是由弟子记载口述，

相传后世。近世的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出版第一册，至今2001年已有19册。李氏在1995年去世时出了17册。但此书由李氏生前已有的“剑桥大学李氏研究所”组织主持，所以在李氏去世后仍可持续地出版。

如果我这个推想是对的话，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人类”与“地球”的相互关系，必须持有互保互爱的态度与行动，和顾存到下一代的延续。

有了这一种假设，我们便可以反思、回顾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人类的成败，再大胆尝试推论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思想等理论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奢望中国在21世纪在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和可扮演什么角色。

要进一步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和“持久性”，我们首先要回顾、了解一些“历史性”的现象；再推论“必然性”的发展。拙文恐怕多是有“论”无“证”，缺乏数据，望有识之士正之和证之。

二、“可持续发展”一词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百废待兴。中国再陷入内战之时，美国以战胜国姿态登上了“世界警察”的舞台。美国本土虽然连一场小仗也没打过，但其国内大都市皆存有“贫民窟”(ghettos)，与欧洲受过战争破坏的都市相比，其颓垣败瓦，有过之而无不及。战后美国，作为第一富国，加上政客要改善市容，所以立志重建。

“贫民窟”重建的迫切，其实不单是市容，而是想把多年窝藏在窟里的流氓、小偷、毒犯、甚至杀人犯的巢穴一扫而清。重建阳光充沛、卫生完善、井井有条的住宅区，为此整顿富国市容。当年的黑人抗议口号是“市区重建即是赶走黑人”(Urban Renewal Means Negroes Removal)!

结果是重建投资甚巨。建成后，贫民搬出了，却没有钱租房或买回以前居住过地域重建的新楼房。有钱买楼的人亦因该地域的前居民多是

黑人、流氓的“区域形象”，而没有在此居住或买房子欲望。最后，少数中产阶级租房或买房入住，居民寥寥无几。

因为人口稀疏，丢空的楼宇日久失修，警力薄弱，流氓渐渐回流。加上20世纪50年代的规划师、建筑师缺乏区域性安全意识，街巷夜间照明甚差，转弯抹角的地方成为抢劫的“乐园”，盗贼充道。继而猖狂地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地施以暴力行径。被劫的受害者虽然大声呼救，住户却是充耳不闻，关门闭户，人人自危。见义勇为的人自身难保，开始陆续搬出，建筑物十室九空，最后无人居住。当然亦无人付水电费，门户破落，垃圾堆积，原居民又大批搬回去。不用交租，不用买楼，贫民、流氓使新区又沦为新贫民窟。政府不能忍受，只有把它再拆或索性爆破，夷为平地。

这类故事详载于由一位美国女新闻记者(丈夫是建筑师)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著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年首版。

20世纪40年代英国伦敦满目疮痍，50年代大兴土木之时，城市规划师想出了一个“卫星城”的计划。在伦敦远郊一个小时火车程内兴建新城市，希望把挤塞的伦敦市区内一些破旧的商业和住宅区迁往远郊，使伦敦有重建的空间。有些大型机构，受了政府优惠条件的吸引，迁往新城。但因当时的信息科技原始，交通网和通信设备不足，教育、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不健全，首批搬往卫星城的商业机构和家庭又搬回伦敦，卫星城发展不能持续。

在巴西，20世纪50年代兴建新首都巴西利亚(Brasilia)，轰动建筑界的首都设计国际比赛结果，把新首都置于国家地图中心的设计胜出。当时参加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是我读城市规划第二年任伦敦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院长。他回来后作了学术报告，详情记不清楚，只记得他谈到巴西政治家们向往一位巴西建筑师的设计所带出的一个戏剧性的故事。他说“这个设计有两大特点：第一，以迁都址选在巴西地图中央为

第一特点!第二,设计者把首都规划建成飞机形状,把行政中枢放在飞机驾驶舱位置,容易控制。结果“中心论”和“拟机论”的两个特点设计获胜!”当然,这是典型英国学者的讥讽评词,有点夸张,但迁都确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大事,不可轻举。

后来因为基础设施没有及时兴建,如飞机场、公路网、铁路网、供水、发电、电信等设备,远远比兴建首都建筑物需时更长;又因兴建时输入大量劳工,临时盖搭的营地棚屋,一住便是数十年,变成南美新型贫民窟;投资者采取观望、等候的态度,造成就业机会少,导致发展断断续续。巴西首都发展过程给世界政客、城市规划设计师、建筑师一个很好的“可持续发展”负面教材。

20世纪50年代我在英国的老师,70年代移民到加拿大,著了一本以《建筑与政治》为题的书,其实是叙述英国因政党政治,使建筑业政治化。60年代我在伦敦工作时的设计事务所,老板是工党,我加入时生意兴旺。不足两年,工党大选失败,保守党上台,竟然把设计完成、图纸皆全的项目搁置!推出不同于工党的项目,连建筑师也改聘,多是保守党的!这样的改朝换代不但对建筑业干预,其他如基建、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也如是,不但浪费纳税人的钱和专业人士的心血,亦使很多发展不能持续。

大规模的规划,如快速公路干线、桥梁,甚至机场等也因种种原因,不能持续发展,其中比较富戏剧性的书是《20世纪规划大灾难》(Great Planning Disasters of the 20th Century)由霍尔撰写(Peter Hall),1980年初版。凡是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的人士都应一读。

20世纪60~70年代是“现代派”的天下,全球一窝蜂信奉由德、法、美等国家几位现代派建筑师(详情参阅罗小未《现代建筑奠基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建筑文库》之一,1991年初版,或看《The Master Builders》,Peter Blake著,Victor Gollancz Ltd.,1960)。可惜,不幸的是,现代建筑运动的精神不能保持下来,而且把它教条化。其中因

素是理论不能好好地实现，过于依赖机器制成品，建材和建筑物组成单元制度化(如玻璃幕墙、预制构件)，空间概念不够灵活，立面重复、呆板，很多实际的细节不能解决(如外墙剥落、污水痕)，颜色单调等。第一代的精神变为神话，由建筑细节至都市设计都显得生硬、呆板，缺乏生气。美国一位自称第四代建筑师的布莱克(Peter Blake)，被当时同行称为“叛徒”，写了一本书，名为《造型追随失败》(Form Follows Fiasco) 1974，套用现代建筑运动口号“造型追随功能”，讥述以上的失败。其实失败不是第一代奠基人，而是他们的信徒未能持续发展而已。

这种种不可持续的发展，世人有目共睹。以上的几本著作亦唤醒政府、投资者和设计者，建设项目越大，风险越大；不能持续发展的规划和设计浪费甚巨，费时失事。1980年初西方规划师提倡“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口号，一呼百应。

事实上，可持续的发展，不单是指城规和建筑业。深一层的意义，早已由环保学者发出警告。再深一层的哲理，更早有思想家说出道理了(请参看本文九-2及九-3节)。不过人类的无知和贪婪自私心，驱使大势走向立竿见影的发展，很少人顾及下一代。更有强权、霸心的国家，只顾自己国家可以持续发展而不择手段，漠视他国的死活！

三、可持续发展——香港模式问题

香港的房地产发展个案，相信已是人所共知。不厌其烦地简略说说。

房地产商品化是经济发展各种支柱之一，如同工业产品、股票、期指、旅游业、物流、矿业、饮食、酒店等。除了可供工作、居住、工业生产等等生活必需“硬件”外，办公楼、住房、工厂等建筑物还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和投资。一般国家把医院、学府、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展览馆、政府机关等公共建筑物由国家或省、市政府发展，是属非商品性的建筑物。一般国家亦有平衡发展计划，鼓励分散投资。就历史、地

理、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资本)等国情,发展平稳可持续的几大经济支柱(如工业、旅游、金融、海陆空航运、物流、品牌设计等);务使在人尽其力、物尽其用(以最少资源可获最大的利益)的原则下,长远、持久地发展和发达。

但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经过英国人一个半世纪的统治,1997年回归祖国后,至今仍然是一个缺乏归属感的暂时居留所。在这种暂时性的意识形态下,经济发展策略也是摇晃不定,投机性很强。从1980年代初,中英谈判决定香港必须归还中国后,离港移民每年续增。1998年才开始小量回流,不是香港经济发达,而是移民到的国家经济更不景气!香港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机场”,一旦有机会便飞往别处。从清末起,香港已是南中国一个移民海外的转口站!

港英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相当简单的——投资小,回报大;管理少,效率高;需时短,获利快。港英的经济政策也是一个缺乏归属感的短期性政策,它从来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英国一位作家格林(Felix Green)讥之为《香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既然是借来的东西,又怎能从长计议呢?

20世纪50年代初,由大陆来了一批人,其中有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来了不少“脑动力”的企业家。在70年代中便使香港在国际船务航运业上有三个世界级的“船王”。同期,其他工业,如纺纱、制衣、造船、旅游、酒店等,蒸蒸日上;金融业随之发达,刺激和打下了香港企业的基础。70年代末期,房地产业开始抬头。80年代中,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世界投资者无不趋赴。香港汇丰银行也兴建了当时全球造价最昂贵的、高科技的总部大厦。一时小小的香港成为世界最新颖“建筑展览”场地。80年代中,是香港房地产蓬勃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大陆改革开放,西方经济放缓,香港人口再次剧增,外资继而涌入,房地产求过于供等等因素,导致本港经济转型;房地产一枝独秀,工业开始北移。90年代初,一二年间,十间大酒

店关闭，改建为办公大楼；不是业务不佳，而是酒店服务行业需要众多职工和管理人员，而且薪金跃升(20世纪80年代中兴建酒店失控，竞争颇为激烈)，管理复杂，容易形成劳资纠纷。最大的原因是办公写字楼房地产只需少量人力，建成便可租售，干手净脚，管理上比较酒店简单得多。更何况，当时房地产的盈利百倍于其他行业，无往而不利！

港英政府经济发展，几十年来，缺乏长远计划。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一套全盘计划也不迟。简单的做法，可以仿效世界其他小国，如瑞士、瑞典等，鼓励本地和外资企业家，分散投资。在香港地少人多，金融体制灵活，传统进出口机制畅顺的情况下，在投资工业、旅游业等长线企业发展上，贷款、集资条件上优厚或放宽；对投机的房地产业上，基本资本、贷款条件要求上，比较严格；更可在盈利方面和在课税上作出调整，使香港人继续发挥灵活的企业头脑，继续分散投资。但这样做，港英政府架构，也同时需要在经济人才和组织上有结构性的改造；不但在数量上要增加，而且在素质上也要提高。政府不但没有检讨、重整，更顺水推舟(如买地政策，重建条件等等)，以利为上，最后造成其他工业、企业一窝蜂“转型”投资房地产业。于是几十年创建的工业、酒店业、航运业、制衣业，连传统的酱油业、制漆业等，纷纷把这等辛勤得来的各行各业所占的土地，发展为房地产业。十年之间已产生世界首富多名，最要命的是导致中产阶级受了羊群效应，也投资房地产；劳工阶级也炒房地产股票；工业、企业家的子弟，由外国学成归港的，也由家长劝导或强迫加入房地产业行业。个别学习高科技的子弟，如物理、生化、放射、电子、基因、信息等，回港不能找到高科技工作，更不用说任何科学研究中心，以致无用武之地。当时的家长，鼓励子弟攻读建筑、城规、房地产管理、土地、建筑物测量、估价和结构、土方工程等专业。这种资本投资、学术投资，根本不是投资，而是投机！科技、工业院校毕业的子弟，为避免学非所用，只好当教师，或回到外国去找工作！

港英经济政策，有意无意之间，造成百业不如地产业好。香港十几年

间,把工业、旅游、服务、金融几大经济支柱,可谓功亏一篑地断送了前途,化为房地产业,成为惟一的支柱。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加上珠江三角洲地带也受香港的房地产业影响,房地产一窝蜂地旺盛起来。港人以一二成的价格,在三角洲便可以购买公寓式的楼房:以三四成的价格便可以购买有前后花园的“洋房”。同时,亦有大批港人回内地工作,只在周末回港,更是在内地租、买物业的理由。不但对香港房地产物业雪上加霜,亦种下即将来临的“烂尾楼”风暴!

造成这种经济局面,只能怪港英政府因利成便的卖地、一律式课税制度、不鼓励分散投资;特区政府没有在激流中勇退(如对房地产盈利抽重税,其他企业抽轻税,甚至优待贷款等措施);不及时组织金融智囊团献计,在西方的经济游戏规则范围内,如何脱险外,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专家应该合力研究健全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致重蹈覆辙;使香港和内地走上长线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英谚语“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Put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但长远的自由经济政策上,不能不作一些计划干预,如贷款,盈利上设置对某种“篮子”鼓励优待,某种“篮子”加以调节、控制。亡羊补牢,现在开始调整,以珠江三角洲为基础,与内地为经济配套,也是不迟的,也是长线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法。

目前,香港建筑师可以设计一些多功能在一身的建筑物。比方说,设计住宅的时候,考虑盖成以后,如果住宅不好租、卖,可以用最少的成本改一改,变为酒店,或者是小型写字楼;如果设计工业大厦的时候,考虑适应以最低成本改成住宅、写字楼、展销店。政府要相应地改革土地用途、建筑条例,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改的办法。市场经济变量越大,建筑设计必须随之适应,不需要花太多钱,便可以改变用途。这是可持续理论的起码第一步。所以,新城市、旧城市某区重建,也应考虑整个设计、环境,务使改用以后,不单是改用途的建筑物可以持续,而是令